



# 谢辰生逝世,百岁人生只在文物救亡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1921年,仰韶村遗址的一铲,发掘出了图案绚丽的彩陶片;1922年,祖籍江苏武进的谢辰生,出生于北京。这是两件基本没有什么关联的小事,毕竟那两年发生的大事实是太多了。2022年5月2日,新中国第一代文博人、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去世,享年百岁。中国现代考古学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发轫,谢辰生是迄今最完整的见证者。甚至连文物的定义,也是上世纪80年代,谢辰生担任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文物卷编委会主任时,第一次系统、明确阐述的。

当他的前辈们已经载入史册,他的故事也写到了结语处。

1922年,谢辰生出生于一个繁茂的书香门第,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,也就是最早的北大毕业生,历史学家谢国桢是他的堂哥,家族中还有金石学家、新闻学教授、著名记者。小时候,谢辰生住过一阵北京白塔寺锦什坊街的小水胡同1号,那是谢国桢家的房子。

谢国桢比他大20多岁,家中往来无白丁,唐兰、容庚、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、甲骨文专家孙海波,渐渐地,耳濡目染,谢辰生也喜欢上了文史和文物。顺带提一句,这个房子原来的主人是样式雷家,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。

院里有丁香、藤萝架,住着真舒服。在谢辰生的回忆中,那是一个盛满了童年记忆的美好的院子,但是,我还是向往革命。

谢辰生的两个亲哥哥,1932年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,在北平大学附中参加了青年团,从中学起,谢辰生就看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书籍,慢慢地,他想去延安、去参加革命,瞒着家人,谢辰生和几个同学偷偷上路,但一路奔波,几经周折,此行还是停滞在了西安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谢辰生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。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,负责人是郑振铎,谢辰生就开始帮助郑振铎编《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》,目录编了9个月才编成,只是最终文物也没索讨成。

1949年,新中国要成立文物局,郑振铎北



2010年,《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》出版。书中既有对文物保护宏观政策的建言,也有对文化名城、历史街区、文物古迹保护的献策,有对时弊逆行的针砭批评,也有对科学决策的褒扬鼓励。图为谢辰生(左)与单霁翔(右)。

上赴任,谢辰生跟随一同。从此,一直到去世,除了抗美援朝期间的从军经历,谢辰生一辈子没有换过单位,没有离开过文物工作。他家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,写着“平生只做一件事,热血丹心护古城”。这是他88岁时全国文保志愿者赠他的,他对这个评价很认可。

年过八旬后,谢辰生写过一首七绝:革命何妨与世争,平生从未竞峥嵘。愤迎风暴难偕俗,垂老犹能做壮兵。如今,也许文物很火,博物馆很热,文博成为年轻人聚焦的潮流文化。但谢辰生和文物之间发生的故事,几十年来总有着“救亡”的色彩。

1968年,北京修地铁一号线,正好要穿过位于建国门的观象台底下,施工单位打算拆除观象台,把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移到他处保存。这样一个大工程,也考虑到了文物安置问题,但谢辰生还是急,和几位同道一起给周恩来写报告,说这不仅是天文仪器的保存问题,更重要的是同一个点

上有连续数百年的天文记录,全世界仅此一处。周总理收到后,马上做了批示,不仅让地铁绕道,还批了绕道所需的200万元经费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

1992年,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,谢辰生发起并联合76位委员,提交了《应当高度重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文物保护工作》的提案,建议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应超前进行。在1993年的三峡考察中,谢辰生还提出,白鹤梁绝对不能离开原址,不能搬迁,建议搞一个水下博物馆。10年后,重庆涪陵的长江边,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终于开工,并在2009年的5·18国际博物馆日,正式对外开放。

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,文博界耳熟能详的十六字工作方针,是2002年修订文物保护法时,谢辰生积极推动写入总则的。当时,谢辰生参与起草的我国第一部文化领域法律文物保护法已经颁布了20年,社会环境已经出现了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
谢辰生曾直言不讳地说道:前30年的破坏,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,但是在今天,主要是利益问题。他认为,文物价值经济化、文物工作产业化、文物管理市场化、文物产权国际化是当时文物工作的四种错误倾向。

保护文化遗产,增强人民的保护意识也很重要。2005年7月,谢辰生等11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国家领导人,呼吁设立“文化遗产日”。从2006年开始,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成为我国的“文化遗产日”。

2002年3月,谢辰生曾到营造学社的旧址李庄,说了这样一番话: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日是纪念梁思成开始的,而现在危机最大的就是从纪念梁思成的保护,梁先生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。我和梁先生没有什么交往,但他的思想影响了我半个世纪。当年的“梁陈方案”没有实现,但是在50年后,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,明确提出“旧城整体保护”的原则,这算是告慰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了。

其实,谢辰生1994年就离休了,很多事情都是在他离休后干的。2010年,他还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信,针对社会上文物收藏的乱象,建议编纂出版《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集》,以正本清源。这一倡议当即得到批准并组织实施,5年后,他看到了首批书籍出版。

当年跟着郑振铎整理文物的小谢,就这样慢慢成了“谢老”,直呼他名字的人越来越少。谢辰生的故事,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文物保护史,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在他之前。郑振铎、梁思成、夏鼐、谢稚柳、郑孝夔、宿白、罗哲文、张忠培。谢辰生说过一句话,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。将来,还会有更多的人在文物保护的这条路上,循着前人的尝试与坚持,前行。

参考资料:《谢辰生口述: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》,谢辰生、姚选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8年;《当前文物工作的四种错误倾向》,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纪念《文物保护法》颁布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》,谢辰生,《中国文物科学研究》,2013-03;《文物》词条,载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文物·博物馆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3年。

# 卧底刺杀设专门机构

□ 成长

近日,由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风起陇西》正在热播,剧中以诸葛亮北伐为背景,魏蜀两国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报暗战,真相扑朔迷离。剧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虽然是虚构的,但它所描写的情报战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据史料记载,早在夏朝时就出现了最早的间谍,女艾,她帮助少康复兴夏朝,刺杀了劲敌浇。《孙子兵法》中专门列有《用间篇》,将情报战作为军事作战中的重要手段,无所不用间也。

三国是天下纷争、奇谋迭现、英雄辈出的大时代,也是谍战的黄金时代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刘纂语:“满诈相雄,有自来矣。若其有阙,庸可弃乎?宜遣间谍,以观其势。”明确指出在采取军事攻伐前,要先派遣间谍探查敌军虚实,搜集军事情报。

然而,由于谍战的隐秘属性,史书中对其鲜少提及。但从记载三国历史的权威史书《三国志》中,我们还是能够窥见一丝三国历史上真实谍战的风雨腥风。

## 曹魏间谍卧底东吴,至死没有供出同伙

三国历史中最为传奇的间谍,莫过魏谍隐蕃。230年,正是魏蜀吴三足鼎立之时,年仅22岁的青州人隐蕃从曹魏南下归吴,成为吴主孙权的座上宾。隐蕃口才很好,谈及天下形势头头是道,孙权对他很欣赏,打算重用。身边的亲信胡综提醒孙权,说这个隐蕃只是一个像东方朔、祢衡这样的巧辩之士,不见得有真才实学。但孙权没有听他的,依旧让隐蕃担任了廷尉监。

实际上,隐蕃的真实身份是魏明帝曹叡派往东吴卧底的间谍,他的任务就是在东吴担任高官,离间大臣之间的关系。隐蕃这个名字甚至都可能是个化名,寓意“隐藏着藩国”。

隐蕃担任廷尉监后,迅速展开了活动。在东吴广泛结交各类名士,编织关系网。比如,隐蕃将笼络的对象集中在东吴政坛比较边缘的蜀汉降臣身上,他的上司廷尉都督就与他来往密切,盛赞他有“王佐之才”。太常潘濬之子潘濞不仅与他交好,还经常馈赠他金钱。此外,孙权的女婿左将军朱据、卫将军全琮都与他倾心敬待。众人见此情形,也争相与隐蕃交往,一时间隐蕃的府邸“常车马云集,宾客盈堂”。

然而仅仅一年的时间,隐蕃就暴露了。暴露的原因是东吴对曹魏实施了情报战,派中郎将孙布诈降,诱引魏将王凌,并设下包围圈准备伏击魏军。隐蕃为了向王凌示警,提前行动,但事机泄露被捕。王凌察觉异常,及时退兵,避免了一场惨败。隐蕃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,拯救了魏军。

隐蕃被捕后,面对酷刑不为所屈。孙权亲自提审他,要他供出同伙,隐蕃却说,“孙君,丈夫图事,岂有伴?烈士死,不同相牵耳。”之后从容赴死。隐蕃至死也没有供出同伙,堪称一名忠贞的谍报人员。

隐蕃的死也在东吴带来了涟漪效应,郝普被逼自杀,朱据遭到禁锢,孙权对大臣们越来越多疑,以至于酿成了孙权晚年一系列政治内斗,东吴的国力也就此衰落。

# 揭秘三国乱世的真实谍战



《风起陇西》剧照

万人。费祎一死,姜维没有掣肘,立即发动了对曹魏的大规模进攻。郭循的刺杀行为如果是曹魏指使,岂不是一搬石砸脚?

因此,这场由曹魏叛将所引发的刺杀案就变得迷雾重重,有人猜测是姜维利用他杀死费祎,除掉政敌,还有人猜测是刘禅在幕后主导了这场戏,意在防止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。马伯庸小说《街亭》在此基础上还开了个脑洞,写成马谲在逃亡后用郭循的名字潜回蜀汉,刺杀费祎,完成了自己的复仇。总之,这起刺杀案因为史料缺乏,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

## 文字笔迹里的情报战

谍战剧中的许多情报都是通过文字密语来传递的,而在三国时期,人们已经熟练地从文字笔迹中破解谜团,通过文字笔迹来展开情报战。

曹操手下有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叫国渊,曹操让他担任魏郡太守。当时曹操刚统治河北,有一些反对势力写了篇文章诽谤朝政,在社会中广为流传,影响很坏。但因为文章是匿名,查不到源头,曹操便委派国渊处理此事。

国渊拿到这篇文章仔细分析,发现作者在行文中经常引用东汉文学家张衡所作的《二京赋》,于是心生一计。他找来三个情报人员假扮字子,让他们去城内拜师求学,尤其是寻找精通《二京赋》的人求救。

不久,这三个人果然找到了能教《二京赋》的老师,并且按照国渊的要求,带回老师的书信作为学习的凭证。国渊将几封书信和诽谤文章比对,发现其中一人的字迹和诽谤文章如出一辙,于是立即将那人抓来审问,果然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。

此外,大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,还曾经凭借自己高超的书法造诣,模仿敌将亲属的笔迹撰写劝降书,成功策反敌将,为司马昭平定淮南叛乱立了大功。

## 中国古代专门的情报机构始自三国

作为三国时期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曹操十分重视情报工作。他在自己的丞相府府官体系中专门设立了“校事”一职,其任务就是为曹操充当耳目,刺探臣子的言行,获取情报。

曹操用卢洪、赵达二人担任校事,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,经常恶意构陷官员,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。《魏略》载:“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:‘不畏曹公,但畏卢洪,卢洪尚可,赵达杀我。’”

卢洪、赵达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朝臣极大的怨言。曹操为了平息众怒,即磨杀驴,处死了二人。但到了曹丕时期,校事的权力更重,校事刘慈在数年间,举吏民奸罪以万数。后来在朝臣的强烈反对之下,曹操才罢除了校事一职。

然而在东吴,孙权对曹操有样学样,仿效校事制度设立了中书典校事,由酷吏吕壹负责,监视群臣,弹劾官员,让东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。史载吕壹“性苛刻,用法深刻,连太子孙登都多次上谏,请求罢免。最终在朝臣的压力下,孙权不得不处死吕壹来安抚群臣。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中,编号1296的简牍就发现了“中书典校事吕壹”字样。

此外,东吴还有名为“察战”的间谍,直接隶属皇帝,吴末东吴陆皓时,民间有谣传陆皓叔父、章安侯孙奋当立为帝。孙皓派察战带着毒药,将孙奋及其五子全部毒死,手段极其残忍。

□ 程遂营

重庆位于长江上游,有长江干流和嘉陵江流过,三面环水,风景别致。尤其是朝天门码头的洪崖洞建筑,让人叹服重庆人的生存智慧。重庆在古代被称为“巴”,这座城市的往事,要从古老而神秘的巴国说起。

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对“巴”字有这样一个解释:虫也。或曰食象蛇。象形。意思是,巴是一个象形字,像一条盘曲起来的蛇,正在张开大口吞吃东西。这种蛇还是食象蛇,能吞吃大象。《山海经》里记载,西南地区有个巴国,这个地方有一种黑蛇,身长千寻,能吞吃大象。但因为象太大了,很难消化,所以,三年之后,蛇才将无法消化的象的骨头从嘴里吐出来。

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的背后,告诉人们这样一些事实:

首先,古代重庆地区气候温湿、水网密布、林密山多,很适合蛇的生存繁衍。古代重庆地区被称为“巴地”,而生活在那里的人就被称为“巴人”。其次,重庆地区以高山大川为主,盆地和平原很少,巴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空间,靠渔猎为生,逐渐形成的巴文化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山地文化、渔猎文化。这深刻影响了巴人的个性特点,并使其最终与蜀文化有较大差别。

后来,巴人和巴国继承了这种特殊的文化传统。公元前1046年,武王伐纣,双方在牧野决战。武王率领的八百诸侯中,就包括了巴人和蜀人组成的军队。

当时,蜀师和巴师都被武王当作先锋部队来使用,但巴师发挥的作用更突出一些。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载:“巴师勇锐,歌舞以凌敌,人前徒倒戈。巴人作战的方式很独特,士兵们手拿武器,边歌边舞,一路冲锋。商的部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,一些胆小的就临阵倒戈,向后败退。”

这种歌舞是什么样的,史书没有记载。但可以推想,巴人长期生活在高山大川之间,要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,他们的歌舞应该是在狩猎、祭祀过程中逐渐形成,铿锵有力、具有强大的威慑力。

周朝建立后,实行分封制,按照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个等级分封诸侯,分封巴地为子国,并把周朝的一个姬姓宗室封到了那里,历史上称为巴子国,简称巴国。都城设在江州,即今重庆的渝中区。江州处于嘉陵江与长江干流交汇处,三面环水,好似江中之洲,故名。

从这个时间算起,重庆有着超过3000年的建城史。巴国一直存在了700多年,直到公元前316年,被秦国所灭。最鼎盛的时候,其疆域包括今重庆全境,还有四川东部、陕西南部、湖北西部以及贵州北部等地。

巴国都城时有迁徙,曾迁至今重庆合川、丰都以及四川阆中等地,但在这些地方建都的时间都不长,绝大部分时间都以江州为都城。从对古江州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,当时的城市已初具规模,有固定的宫殿区和商业区。这都证明,在700多年的岁月中,江州都是巴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
战国晚期,巴国西和北与蜀国、秦国相接,东与楚国相邻,随着秦、楚等战国七雄日渐强大,巴国面临生存危机,国内统治也开始走下坡路。公元前4世纪,巴国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,巴国国力衰弱,一时无法平息,连都城江州都危在旦夕。

这时,巴国有一位巴蔓子将军(生卒年不详)向巴王建议,请求楚国出兵帮助平叛。巴王同意了,派巴蔓子沿江而下,到楚国求援。当时,借助于长江便利的水上交通,巴与楚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。据史料记载,巴与楚还长期结为姻亲之好,以此对抗蜀国和秦国。

巴蔓子抵达楚国都城郢都(今湖北荆州)时,却遇到了大麻烦。当时的诸侯国都以各自利益为重,楚怀王说,出兵可以,但事成之后,巴国要割让三座城邑给楚国作为回报。不答应,巴国危在旦夕;答应,则意味着背叛巴国,况且临行前巴王也没有授予巴蔓子这个权力。然而,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极为不便,事出紧急,巴蔓子略一思索,便爽快地答应了楚王的条件。楚国也马上出兵,跟随巴蔓子进入巴国,很快平定了内乱。

不久,楚王派出使者到巴国,索要三城。巴王一听,一头雾水,因为巴蔓子并没有将此事报告给他。这时候,巴蔓子站了出来,陈述了事情原委。君臣听后,一片沉寂。关于巴蔓子答应割让的三城,有一种说法是都位于重庆东部的三峡一带,临近楚国。从地理位置看,这是巴国向东防御的屏障,如果把这三座城割让给了楚国,等于门户大开。

对此,巴蔓子早已打定主意,没等巴王回话,便站出来对楚国使臣说,大丈夫应遵守承诺,但巴国国土不可分割,我一个将军怎么有权私自割让?宁可一死来谢良言之罪。说罢,巴蔓子拔出宝剑,自刎而亡。

楚国使臣只好带着巴蔓子的头颅返回郢都,把详情向楚王作了汇报。楚怀王感佩,如果楚国能得到巴蔓子这样的将军,又怎么会在乎几座城池呢!于是,楚怀王以上将军之礼厚葬了巴蔓子的头颅,而巴国则以上卿之礼隆重埋葬了巴蔓子的躯体。

今天重庆的七星岗,有巴蔓子将军的墓,据说就是埋葬巴蔓子躯体的地方,也有说巴蔓子的身躯葬在了湖北利川或重庆忠县。后世人们都敬仰巴蔓子,还修了巴王庙敬奉他。

到了三国时期,老将严颜说的“但有断头将军,无有降将军”,断头将军就是指的是巴国英雄巴蔓子。唐贞观八年(634),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巴蔓子,下诏把巴蔓子的祖籍临江城改名为忠州,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忠县,让巴蔓子的英雄事迹世代铭记。

(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,《百家讲坛》六大古都·黄河上的古都·丝路上的古城主讲人)



2021年4月17日,神秘的巴国展览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。展览共展出文物378件(套),以巴文化区商周至西汉时期青铜器为主,其中珍贵文物96件。展览汇集了渝、川、鄂等多家文博单位收藏的巴文化文物精品,是全国首次全面、系统展示巴国历史文化的大联展。视觉中国供图